

讲述·老兵心路

将岁月刻在山的胸膛

■吴佳

“刚发现这几本日记的时候，有好几本被老鼠咬烂了，我差点当废品扔了。”

杨威林的父亲杨伯成，生于1927年，17岁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，抗战胜利后随军北撤。

前提过此事，只是将自己南征北战的光辉岁月，尘封在家中的角落。

南征北战的老兵和他的军旅日记

■倪梦萍 何鸿凌 石晓雨



兵之初 成长有“烦恼”

都说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。一名年轻人在军营里如何“淬炼”成长？

翻开杨伯成写于山东定陶的一篇日记，这样写道——

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记于介河（此庄离城武东门三里）。今天由大李庄转此行程约七十里，足足跑了九个钟头。”

“早上起来便接通知，下午四时吃晚饭，完毕于丑时出发，整理好行装后称了称共十三斤……到五里以后，到底吃不消了，一连落伍三次，此时我很想减少负担。”

轻装吧，我没有重装，现有的衣服、被、毯，再不可缺少了，因此又想打报告给丁柯同志，要求由公家来负担五斤，并且想好了许多理由，且有相当决心。

但到了宿营地，背包也放下了，行军时的吃不消似乎又记不起来了，决心报告又随之淡漠下来……”

1947年，杨伯成20岁，入伍3年。杨威林说，父亲告诉过他，入伍时身高不足一米六五，体重不到70斤。

即便是当了3年兵，负重13斤行军70里，对杨伯成来说还是有些难以承受。尽管如此，伴随一路上内心的纠结，杨伯成坚持了下来，将希望分推行李的请求吞进了肚子里。

杨伯成在另一篇日记中也记录下了一段心路历程：“……在被推选为候选者的自我检讨中，对同志们很有帮助，对我也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。在他们的深刻检讨中，也暴露了我的许多缺点（其中许多是我以前未发觉的），引起我自我检讨的决心。”

杨伯成就是这样，在行军的同时，在记日记的时刻，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，充分体现了善于自省、严于律己的作风。

战场上 苦中亦有乐

杨伯成曾随志愿军20军60师奔赴朝鲜战场。炮火纷飞中，他没有丢掉日记的习惯，在朝鲜伊川郡王幕里写下的约47000余字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杨威林翻出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篇日记念了出来：“这一段时间，虽是（朝鲜的）8月，半夜里常常被冻醒，哈出来的气在被子上面结了一层霜……”

杨威林由此想起父亲总被母亲埋怨的那个“坏习惯”。一到冬天，父亲睡觉时从不脱袜子，还总把棉衣棉裤盖在被子上。“看了父亲的日记，我好像有些明白了。当年在朝鲜，天寒地冻，这样睡觉最保暖，也是应对突发战况最好的方式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个习惯伴随了父亲的大半生。”

逐字逐句翻看了父亲的日记后，杨威林发现，父亲经历过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变得清晰，每一处细节都跃然纸上，带他回到那个年代，感受父亲的军旅生活。

“父亲平日里很少跟我们讲他打仗的事。”杨威林1965年出生在军营，随父亲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童年。“有时父亲高兴了，会在饭桌上讲一些当年在战场上的趣事。有些事我们不信，只当他在开玩笑。”

杨伯成说过，一次行军时，他一顿吃了7缸饭，是那种1斤装的缸子。他还不是吃得最多的，吃得最多的战友吃了12缸饭。当时杨威林不相信，一个人饭量再大，也吃不下那么多饭啊！杨伯成还常说一句话，“走路不会睡觉的话早就死了”。每次家人听到后都是哈哈一笑，并不当真。

然而，这些家人曾经以为的玩笑话，杨威林在父亲的日记中都找到了“出处”。他终于明白，当年行军，父亲和战友很可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遇到

另一篇写于王幕里的日记，让杨威林对父亲的了解更深入了一些。这篇日记写于1951年，杨伯成记录了一个“有趣”的夜晚。

当时，连队正在坑道里放映苏联电影《攻克柏林》，美国人的轰炸机突然在坑道上空盘旋，两种轰鸣似乎形成了“同期声”。“相映成趣，一时间分不清哪一个电影里的声音，哪一个现实中美军轰炸的声音。”杨伯成如此写道。

杨威林觉得，这是父亲作为“文艺青年”的独特浪漫情怀。“父亲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，日记记得这么全，想来当时一有空余时间，他应该就掏出小小的日记本来记录。”

日记外 还是那个兵

能敞口吃的时候，就要为接下来的几天“储存能量”。他们行军也一定很紧张，敌人在后面追赶，丝毫不能松懈，没办法停下来休息，只能是边走边“睡”。

杨伯成和家人讲他很幸运，福大命大。一次，部队在防空洞里开会，敌人一个炸弹扔下来，除了他，防空洞里的其他战友都牺牲了。“父亲说他要好好活着，替战友好好活下去，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。”在杨威林看来，父亲后半生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印证。

1979年，杨伯成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浙江绍兴，在一所学校担任党支部副书记、副校长。退休后，他在绍兴新四军研究会从事扶贫工作，帮助贫困山区群众，帮助困难退役军人，为《东南烽火》《大江南北》等

1951年10月16日，在王幕里的日记中，杨伯成密密麻麻写下一篇悼文，寄托了他对牺牲战友深深的哀思。

“昨日接到盛永祥同志的来信，告以陈科长在12日晚遭敌机袭击受重伤而牺牲，使我感到突然而不敢相信。但事实终究是事实，陈科长能力较强作风较好（曾被选为模范候选人，差一票落选），在军政治部是一个威信较高的团级干部，我过去在他那里工作时对他印象也较好。他对工作认真负责，生活作风朴素，待人真诚，是我们学习的模范。”

“记得今年一月初，他曾带病坚持行军。到达王幕里附近的安西里时，体温高达40度（摄氏度，编者注），那时邱

主任决定用吉普车送他至20军医院，我曾扶他上车，替他盖被，离开时还互相打招呼。后他转至大连休养，至三月底时返回秘书科。那时我已调至教导团学习，我到这里工作后，也曾与他通过信。想不到那次送他上车的一天成最后一次见面！这多么使人难受！”

“陈科长与我一起工作时，也曾有过不高兴的事，但他已牺牲的今天，我把这些都忘了，脑子里映出一连串他的好处，他对我的帮助。陈科长是有十余年战斗经历的老干部，除拥有高尚的品质之外，还有丰富的经验与工作能力，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，对总部做出了不少的贡献。如今，他再也不能工作了，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损失。”

为了时刻“提醒”父亲，杨威林写了一段话贴在墙上，帮助父亲记住自己和家人的名字，记住他17岁参军，打败了日本鬼子和美帝国主义，要“多活动、多说话、多读报纸，脑子不糊涂”。最后一句这样写道——

“我要好好活着，我要看祖国兴旺发达，我要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！”杨伯成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，念着念着就笑起来。

“现在常说‘不忘初心’。对于父亲来说，他对党和国家自始至终只有一颗红心。”说到这里，杨威林有些哽咽。

图①：年轻时的杨伯成。

图②：杨伯成写下的日记片段。

图③：杨伯成的14本军旅日记。

图④：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杨伯成拍摄了很多战斗场景。这是他拍摄的朝鲜战场上战士们分发土豆当饭吃。

图⑤：杨伯成保存的军功章和纪念章。（摄影：袁依凡、袁媛、张章璐，制图：唐硕）

“当年在西藏，我们之所以能平定叛乱，靠的就是赢得人心，争取西藏各族群众的支持。”在湖北省宜昌市白龙井军休所，戎马一生的84岁老兵车炳章聊起当年进藏的经历，饱含深情。

1955年，18岁的车炳章参军入伍，来到西藏军区第53师，开始了在雪域高原长达15年的军旅生活。

“我们新兵乘坐大篷车，沿着刚刚修通的康藏公路走了十多天，才来到西藏扎木的顿多宗。”车炳章说，高原缺氧，空气干燥，住茅草屋，点煤油灯，但官兵没有一个人叫苦，没有蔬菜，他们就自己种，没有房子，他们就自己建，“挖野菜，喝雪水，也是常事”。

恶劣的高原气候，对车炳章和战友是很大的考验。“后来到了藏北唐古拉山一带，因为长时间在雪地行军，我得了雪盲症，发起高烧，一时间眼睛什么也看不见。”即便如此，车炳章继续随部队行进，晚上休息时，就用冰水敷敷眼睛。

车炳章回忆，那时他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心里并不害怕。“刚进藏时，身上的病痛难不倒我们，让我们棘手的是与西藏各族群众的沟通交流。”

“部队刚进藏时，由于当地反动势力长期进行虚假宣传，散布谣言，说‘红汉人’见到人就杀，见到牲畜就抢，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对我们持怀疑态度。”谈起当时的复杂形势，车炳章说，虽然那时西藏已经和平解放4年多了，但在藏南一些

地区，还有反动势力对共产党、解放军进行造谣污蔑。

1957年的一天，车炳章所在团接到赴昌都地区剿匪的命令。沿途他们发现有些村庄的村民都跑光了，“村里村外见不到一个人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锁，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。”后来当地向导告诉他们，盘踞在昌都的反动势力此前大肆造谣解放军要来打劫，“因此，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部队到来之前，连夜逃往外地。”

军队打仗仗，人民是靠山。为尽快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，在昌都结束剿匪任务后，上级给车炳章所在连队派来藏语翻译，协助部队开展群众工作。官兵一边训练，一边帮驻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，帮他们背水、扫地、打柴、修补房屋，帮医还免费为生病的藏族群众治病。

“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的同时，我

84岁老兵车炳章回忆进藏往事——

让幸福的花朵开遍西藏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朱勇 通讯员 陈晓蕾

他们还积极宣传党在西藏的方针政策，让西藏各族群众明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幸福的，要让幸福的花朵开遍西藏。”车炳章说，部队要求所有官兵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允许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，“即使缺粮挨饿，也决不能要群众一粒粮食；宁可在外露宿，也不进老百姓的屋子。”

一次，车炳章所在连队因取暖需要到当地村民家中借了柴火，离开时留下用信封装着的感谢信和钱，“他们真切感受到解放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军队，到处宣扬共产党好、解放军好！”

“我们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，一名叫卓嘎的藏族小伙子专门来为我们送行。他说‘金珠玛米’都是好人，以前自己被不好意的人利用了。”谈起当时的群众工作，车炳章说，人民军队的作风和纪律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驱散了西藏各族

群众的疑虑，赢得了他们的心。

车炳章回忆，为了让西藏各族群众真正相信共产党，相信解放军，当时部队有一条规定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准开第一枪，一些同志为此流血甚至牺牲，“这些付出，西藏各族群众都看在眼里。”后来，许多群众主动给解放军提供情报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给解放军当向导，当地不少适龄青年也积极报名参加入伍。

在西藏逐步走上和平发展之路时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场边境作战打响。我们到西藏去当兵，就是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。”车炳章和战友踊跃报名，上

了前线。

“当时上级计划3天内结束战斗，我们只用了20个小时就歼灭了敌人。”车炳章自豪地回忆起一场战斗，他们团担负回包抄任务，翻山越岭穿插到敌人后方，配合主攻部队一举歼灭敌人精锐力量。

在部队迂回穿插行动中，当地群众主动为解放军带路，很多人把自家的牦牛、马和骡子都牵出来，帮部队运输后勤补给。“正是西藏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，才让我们打了胜仗。”车炳章感慨地说，“一切为了人民，一切依靠人民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！”



我的老单位是个依山而建的军需仓库，1976年建库，2018年因军队调整改革撤编，结束了物资供应保障的历史使命，官兵陆续离开，奔赴新的岗位。唯一例外的是一个老兵，春来秋往依旧与老单位的大山为伴，一直没有离去。

这个老兵叫王守宽，吉林人，1954年出生，1975年入伍，曾是某部一名工程兵。当年，他随部队建好老单位后，就复员留了下来，在附近村庄安家落户，平日种地之余偶尔来营区打点零工。当时，我因为分管营房维修，时常与他接触，对他也有了解。后来，单位组织红色故事演讲比赛，我代表管理处参加，寻找演讲素材时第一个想到了他，希望能从他那里挖掘一些单位建库时的感人故事。一个夜晚，我专程到他家中拜访，从他的口中，了解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我的到来，让王守宽有些激动。年过花甲的他头发斑白，额头上布满岁月雕刻的痕迹，但脸上挂着历经风霜后从容的笑容。

王守宽21岁参军，入伍后不久便随部队来到偏远的大山，开始建设仓库。“刚来的时候，这里除了山还是山，除了森林还是森林，也没几户人家，缺水缺水，种不出粮食。”

“那完全就是白手起家嘛，当时肯定都‘蒙’了吧？”

“嗨，也没想太多，就跟着大家一起干呗。”

王守宽说，官兵们只能用大锤、钢钎、铁锹、风钻等简易工具，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大山里作业。打眼、放炮、排渣，每一米的推进都异常艰难，塌方、透水、滑坡等险情随时可能发生。

王守宽哼唱起一首歌，歌词描写的正是建库时火热的施工场景：“脚踏云霄，手把风枪，将岁月刻在山的胸膛。机声隆隆，汗拌砂浆，用心血突出山的脊梁。嗨嗨，我们筑长城，我们走四方，我们献青春，钢铁铸成长。”

“当时挖山洞，木工、瓦工、水电工，什么活我们都自己干。我当时是风枪工，就是在山体上打炮眼、放炸药。风枪这家伙可不好用，刚开始是打干眼，震得整个人都散架了，粉尘满天飞，吸多了后来老咳嗽，甚至咳出血来。后来改为打湿眼，洞子里又潮湿又阴冷，就是三伏天也得穿着厚厚的工作服，下班了衣服能拧出水来。我有风湿的老毛病，就是那时候湿衣服穿多了得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换衣服呢？”

“换衣服？”王守宽摇摇头，“当时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这个场地刚打完又换一个场地，一天三班倒，再多的衣服也换不过来呀。”

“你们太不容易了。”

“这都不算事儿。那时搞建设，强度大不说，风险也大。两年兵干下来，战友中有好几个牺牲的，都是在施工现场发生的意外。”

说到这里，王守宽朝窗外望了望。看得出来，他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“当初复员后为什么选择留下来？”我打破了他的沉默。

“在这山沟里也挺好的。有时候，四处转转，能想起以前的很多人和很多事。”

2016年春节后，王守宽搬了一次家，但离老单位也不远。我想，有时候付出最多的地方也是最难割舍的地方。当老单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时，还有王守宽这个老工程兵与之相伴，未曾离去。青山无语，老兵有情。